

□ 胡家勇

##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古典复活”

40~50年代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演变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市场解决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和政府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性。6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对早期发展思想进行了反思,其核心内容是对政府、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主张利用市场力量解决发展问题。第二阶段先驱人物西奥多·W·舒尔茨在批评早期发展思想时说:“发展经济学家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赋予政府的功能太多,但政府却没有能力有效履行这些功能。有这样一个政府传统,对发展是很不利的。”<sup>(1)</sup>另一位先驱人物G·哈伯勒认为,支持政府广泛干预发展过程的早期论点,如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有害示范效应论、伪装失业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强调配置效率、市场机制、私人积极性的新古典理论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可见,与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计划和政府干预的有限性,主张把市场机制作用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新古典复活(Neoclassical Resurgence)”。

发展经济学领域“新古典复活”的根本原因是,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对“人”、市场、政府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一、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作了完全不同于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判断。早期观点认为,穷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但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的行为特征并无二致,穷人对经济刺激有利机会历来就有非常敏感的反应,行为准则同样是“利益最大化”。穷人虽然大都是文盲,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赚钱不感兴趣。在对穷人行为模式的研究上,舒尔茨影响最大,他说:“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当地气候以及他的劳动能带来多少果实都了如指掌。所谓的专家往往对此却一无所知……没有知识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主体。”<sup>(2)</sup>舒尔茨不同意发展中国家缺乏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小型企业,户主就是这个小企业的企业家,他能够在自己的活动天地里把自己支配的资源作到优化配置。因此,“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富有效率”。D·拉尔甚至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的经济主体对经济条件变化的反应更灵敏,调整速度更快,因为他们很少有“储蓄”可以依赖。他还认为,传统农民不积极采用新技术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收入仅够糊口的农民当然不敢贸然采用新技术。一旦具备相应条件,如风险分散措施、资金扶持和提供补充投入,农民就会对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绿色革命的成功就是一例。

二、肯定发展中国家各种投入要素之间具有替代性,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早期发展经济学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是刚性的,要素流动性差。但拉尔认为,“国民产品生产不

同要素和商品投入的替代程度在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无太大差别。”<sup>(3)</sup>他是这样论证的,就某种产品而言,技术系数可能是固定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微弱,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难以影响该产品的投入结构。但不同产品间技术系数是不同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影响生产者在不同生产之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存在要素之间的替代性。至于发展中国家要素流动性,拉尔认为这并非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G·哈伯勒也对发展中国家技术系数固定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人的理性行为、要素的替代性和流动性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通过肯定这些前提,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论证市场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可缩小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干预范围提供理论基础。

三、对市场功能的重新论证。H·G·约翰逊在其著作《货币、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对市场功能作了充分论证。他认为,市场不仅能解决现有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有效配置问题,而且具有动态功能,即能够提供增长与发展刺激。例如,它能够刺激人力资本积累,因为高技术能够获得高收入;能够刺激物质资本积累,因为资本能够带来资本化收入。而且,市场的所有功能都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庞大的管理机构,不需要中央决策。所需要的仅仅是保证契约得以顺利履行的法律体系。

约翰逊还对否定市场功能的各类观点作了分析。他认为反市场观点不外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市场不能准确运转。如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熟悉市场;不了解相关信息。如果确是此种情况,适宜的对策不是用政府替代市场,而是传播市场机制赖以有效运转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使用市场机制所必需达到的教育水平。第二类反对意见是,市场运转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包括两点:1、导致不公平结果。但是,如果试图去干预市场所决定的收入分配,马上就会碰到难题;这种干预会妨碍市场效率。“如果不允许人们享受他们决策所带来的收入,他们的决策反过来就会受到影响,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就会受阻……因此,任何一个渴求快速增长的国家固守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是不明智的。”<sup>(4)</sup>约翰逊进一步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事实上并不象我上面指出的那么严重,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快速增长会自动以各种方式促进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sup>(5)</sup>2、市场不能实现高增长。因为从社会利益看,个人储蓄与投资倾向太低。约翰逊认为,即使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也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应该亲自从事发展储蓄与投资。“私人企业在创办和经营上比政府更有效。因此,最好的政策是用税收优惠、补贴、提供廉价信贷来刺激私人企业。同样可取的办法是,通过提高利率水平刺激私人储蓄,而不是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把储蓄资金强制拿到政府手中。”<sup>(6)</sup>通过上述分析,约翰逊的结论是,在许多场合,市场缺陷可以通过变革特殊市场来克服;在另一些场合,市场缺陷克服起来代价昂贵,因而不值得的。发展计划应主要致力于改善和强化市场机制。

对于市场功能,哈拉·明特也作了独到的分析。明特认为,市场能有效解决资源的静态配置问题,而经济发展是动态问题,这是确切的。但就此否认市场机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力度是不科学的。因为静态和动态是不能绝对分开的:现有资源的配置结构是最优的,那么增量资源的配置结构变为最优。反之,增量资源的配置就不可能优化。而增量资源的配置正是动态发展问题。因此,市场机制在有效解决静态问题的同时,也随之促进了动态问题的解决。

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不仅强调国内市场机制对发展的意义,而且强调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针对早期的观点,哈伯勒指出,“贸易理论的静态特征并没有剥夺它解释动态过程的有效性……来自贸易的静态收益能够使一个国家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而且,国际贸易能够从国外吸引资本,促进技术和人才引进,这就意味着静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

了。”<sup>(7)</sup>明特认为自由贸易的动态作用有:动员尚未利用的资源(闲置土地和劳动力)、刺激农民欲望并向他们提供新投入、改善国内交通、通讯和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的扩张能够诱导国内市场的扩大和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发育。”<sup>(8)</sup>对于有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实绩不佳,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国家垄断贸易体制造成的贸易关系扭曲、外汇管制导致的货币的不可兑换性,在外贸战略则失之于产品集中和市场集中。

#### 四、对政府集中解决发展问题局限性的分析。

1、M·托达罗的分析:政府强制工业化会引发城乡人口过度流动。发展初期,人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寄托于政府工业化,但后来证明,政府强制工业化不仅没有解决农村的潜在失业问题,反而造成和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60年代末期,肯尼亚经济学家M·托达罗提出的人口迁移模型对此作了说明。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决策是由两个主要变量决定的,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包括货币收入水平、享受的公共服务数量;二是城市正式部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称为预期收入。依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预期收入,那么,城市失业人口中的存在并不能阻止农村劳动力继续流向城市。因为,迁移者会认为,虽然一时不能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可望在近几年内找到工作,一旦找到工作,所得必然大于所失。所以,在城市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仍会纷纷流入城市,并沉淀到城市中的非正式部门。政府强制工业化形成三股加剧城市失业的力量,一是在短期内,强制工业化虽然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现存失业问题,但它同时提高了城市就业概率和预期收入,诱发一大批新的迁移者;二是强制工业化往往是运用一套扭曲政策(如低利率、资本无偿使用)来实施的,会诱使资本密度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结果降低了一定资本量所能支持就业水平;三是强制工业化是以强制转移农业部门资源为条件的,这会降低农村预期收入,又使一大批处于迁移边缘的劳动力作出迁往城市的决定。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强制工业化无益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应该运用市场机制协调城乡间的资源流动和利益平衡,这样就不会有城市间劳动力的过度迁移。

2、哈拉·明特的分析。明特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剖析过多政府干预的危害。明特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自然二重性特征”,表现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资本市场支离破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在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不均匀分布。自然二重性的根基是发展中国家“组织结构的不完全发育状态”,这种“不发育状态”不仅存在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存在于政府的行政系统和财政、税收系统。在商品市场上,产品的批零差价比发达经济为大,因为农产品从农户到城市或工业品从城市到农户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在资本市场上,有组织金融市场上的利率远远低于无组织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在行政系统,政府指令传递和基层信息收集要经过长长一串行政层次,因此,受歪曲、扭曲的可能性很大;财税系统也不可能有效率,因为向大量分散的经济单位征税交易成本大,税款在层层上交、下拨过程中形成很大的漏洞。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会造成政策性扭曲,政策性扭曲会进一步恶化本已存在的“自然二重性”。如偏向现代部门的资源分配扭曲常常会对传统部门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份额产生消极影响;政府的高利贷法和对小钱庄的抑制会使本已脆弱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金融联系更加脆弱,恶化“金融二重性”。依据上述思路,明特指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从市场不完善出发强调政府干预,殊不知政府的行政系统和财税系统也是不完善的。“很清楚,基于完善计划机构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同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放任政策一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不过是另一个幌子下的完全竞争模型。”<sup>(9)</sup>

3、D·拉尔的分析。要点有:第一,政府干预也要受到信息、交易成本的制约,认为任何形

式的干预都会增进福利和配置效率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在为设计公共政策而获取、处理以及传递有关信息方面,还是在强迫执行政策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成本。于是就如同市场失灵一样,可以举出无数官僚失灵的例子,使政府也难以达到帕累托效果的结果。”<sup>(10)</sup>

第二,政府干预往往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扭曲。扭曲是对市场均衡点的偏离。拉尔认为,不造成经济扭曲的政策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很少的。而且,一种扭曲会造成另一种扭曲,结果形成一个扭曲链条,造成整个经济关系的全面扭曲。拉尔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后继的扭曲实际上是对前面扭曲的补偿,使其恢复本来值。例如,政府出于某种目的把住宅价格或租金控制在均衡值以下,这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使私人房地产商不愿提供住宅,纷纷转向他业。政府不得不亲自提供住宅。但住宅并不会由于是政府提供而少需要建筑材料、地皮及建设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以税收形式向企业筹措建房资金。整个企业界的税后利润因此而减少,工人的工资便低于没有政府建房资金时的水平,而这个水平恰恰是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可见,房价、房租的扭曲最终会导致工资关系的扭曲,工资水平的降低实际上是对低房价、低房租的补偿。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收入再分配。从拉尔的上述观点不难得出结论:政府干预应尽可能少,必要的干预应力求中性,即不偏向任何部门、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第三,拉尔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但他更强调计划的不完善,认为,不完善的市场要胜于不完善的计划。

如何评价6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古典复活”呢?“新古典复活的中心论点是,仅仅由政府集中解决发展问题不行,市场机制不仅能够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而且具有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功能。应该承认,这是对政府和市场认识的深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一直是 we 面临的主题。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的基本是由政府集中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如结构改造资金由政府强制筹措、工业化过程由政府详细规划、城乡利益关系用行政调节、消除贫困完全寄托于政府行动。另一方面,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更不用说解决发展问题的功能。40多年的成就是显然的,但同时引发了一些发展难题,如农业与农民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效益长期低下。“新古典复活”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要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还要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

注(1)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2)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9.

(3) 拉尔:《发展经济学贫困》,118页。

(4)、(5) Meier · G · M: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518—519.

(6) Meier · G · M: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compment*, P519.

(7) *Pioneers in Devecompment*, P. 73.

(8) 同上书,P. 121.

(9)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P. 134.

(10) 拉尔:《发展经济学贫困》,16页。